

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形成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徐 波

在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巨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根据近年陆续公开的大量原始档案材料,目前情况已经逐渐明了: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和解、共御外侮的转变中,张闻天乃是领导中共实现转变的核心领导者。按照实事求是原则,笔者拟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完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作一分析。

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订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曾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主张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又一再强调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击国民党内的各个派别和中间阶级,拒绝“国防政府”的口号。其结果,中国共产党不仅未能与各种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反而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曾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拟订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它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新精神,呼吁国内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但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早

已中断,并不知道《八一宣言》及其内容。^①因此,中国共产党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策略转变,虽也有共产国际的推动,但主要是中共中央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启动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审时度势,以民族大局为重,不为种种复杂的表面现象所惑,果断地调整策略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订者。

张闻天策略思想的转变并非偶然。前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曾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及下层统一战线口号;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张闻天自1932年2月回国后,即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起初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进一步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一开始即参与了上述策略的制订。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不同的是,博古仅把这当作一种宣传口号,而张闻天则从“九一八”后不久即首先在中共党内明确提出:应反对“关门主义”,把统一战线看做是一种行动的策略;“‘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口号,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②;有可能和反动营垒的个别上层分子建立统一战线。这表明,张闻天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实际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的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时,日本正将侵略矛头从东北延伸至华北,大肆策动“华北自治”,图谋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本的疯狂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引起国内外各种矛盾关系的变化。针对这一情况,红军刚刚到达陕北,张闻天即于1935年10月22日在陕北吴起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把

① 至193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才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②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战略任务。^① 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揭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

11月3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领导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所率红十五军团会合,展开军事行动,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率其余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北移瓦窑堡“安家”。到瓦窑堡后,张闻天以全力投入中共战略策略的转变工作。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军事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② 根据此一精神,当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及《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两个文件,对统一战线策略作了新的解释,强调和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都应该联合起来”;以“一切斗争方式”来展开抗日反蒋斗争。^③

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作出了进一步的新阐述。文章指出:目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任务,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④ 文章打破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严重局限,明确地提出了“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并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的策略思想。^⑤

以上情况表明,张闻天在启动中共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

① 《望》1990年第35期,第18页。

② 《望》1990年第35期,第18页。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

④ 原文载《斗争》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

⑤ 同上。

争策略转变的开始,即敏锐地预见到了中共战略转变的方向、道路和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为这一转变划出了基本的轨迹。

11月18日,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国际“七大”精神及《八一宣言》与中共中央策略转变精神是一致的,同时在具体内容上又有一些新的提法,如不再将中间力量视为危险敌人,以及号召组成全国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在吸收这些新内容的基础上,张闻天结合国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进一步全面地加速启动中共策略转变的巨大车轮。11月底,张闻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策略转变问题。在会上张作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的报告和结论。在《报告》中,张闻天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统一战线不只是宣传口号,而且要变成实际的行动;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环节”;关门主义则是阻碍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危险。他号召“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①

作为具体的行动步骤,11月28日,张闻天主持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同全国各种力量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具体提出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②12月6日,张又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他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指出,为适应形势变化,“要改变我们对富农的策略”。^③根据报告和结论,会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放弃过去“加紧反对富农”的“左”的政策,而代之以联合

① 原文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改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② 全文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168页。

③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或中立富农的政策。^① 以此《宣言》的发表和对富农政策的改变为开端，中共以实际行动拉开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转变和策略调整都是由张闻天主持的。张在作出这些重大决策的同时，也数次派人送信或以电报与在前线的毛、周、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气，征求意见，因此，中共策略转变也是领导层的集体决定。但是，张闻天在中共策略转变过程中显然起到了主要领导作用。

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通过正式程序确立下来，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张闻天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并代表政治局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自己的政策，以“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和上层的）”作为党的新的策略路线，并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② 会议之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传达和阐发。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式转变的起点，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它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张闻天不仅是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者，也是会议的领导核心。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史学界仅突出会后“传达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586页。

② 《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告”的作用,而对张闻天所作的会议报告及由他起草而成的会议《决议》,则采取了忽视的态度。事实上,张闻天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任务的报告是会议的主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是会议确定的纲领性文件;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则是对会议精神和《决议》内容的传达、说明、阐释。就两者的内容看,后者所传达和说明的基本问题,如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共的策略路线和若干政策的改变,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等,都是前者已经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和规定的,而不是别作新解。关于这一点,只要将原文加以对勘,两者之间的主辅关系便也显而易见了。

二 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是在国共双方尚处于严重的政治对立、军事对抗的形势下形成的,因此,它是以“抗日反蒋”和“人民共和国”为口号,抗日与反蒋并举。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内要求抗日的力量增长,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逐渐有所改变,国共双方也开始进行秘密接触。根据这些变化,张闻天和中共中央逐步调整策略方针,改变“抗日反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纳入统战对象之内,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一调整中,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代表和主导着策略调整的正确方向。

在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张闻天即已指出:“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①此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以“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口号代替“抗日反蒋”口号。4月6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蒋介石内部起分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策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9页。

略是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的同时，“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和他进行外交”。^①4月30日，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张闻天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把争取白军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当做在目前形势下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没有几百万白军官兵的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发生极大的困难。”同时，“没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展开是不可能的”。^②此后，中共在公开发表的“宣言”、“通电”中（如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逐渐不提“讨蒋”，而代之以“抗日讨逆”口号，并表示了“促进蒋介石氏……最后觉悟”的态度。^③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二中全会，正式提议：立即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并宣布：“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的救国的谈判。”^④不过在当时，蒋正调动军队向陕北苏区进攻，中共在实际上也仍未放弃“反蒋”方针。

8月初，南京方面致函中共中央，提出谈判的若干条件。8月8日，共产党方面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潘带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关于以南京为主要谈判对手的指示和关于国民党方面新意向的一些情报。根据这些情况，8月10日，张闻天在保安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的变化情况和中共的对策。会议上，在关于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上没有大的歧异，在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上则出现较大分歧。当时，毛泽东对蒋的抗日倾向表示怀疑，因而主张继续“倒蒋”，“从政治上去击塌

① 转引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② 《张闻天选集》，第93页。

③ 全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

④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页。

他”，使其“完全瓦解”、“完全破产”。^①张闻天的见解与此不同。他提出并阐述了在新的形势下争取实现国共合作、包括与蒋和南京政府联合的新的策略思想。基于对形势变动的敏锐观察，张指出，当前蒋和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态度虽不能说已有基本的改变，但已表现出“战术上有许多变动”；在策略上也“开始表现他的动摇”，这是有利于抗日大局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策略方针应该进行调整，“不仅揭破他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使之作为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转向抗日。在讲话中，张闻天对于中共在新形势下应采取的策略原则，如怎样推动蒋和南京政府的动摇；怎样在统一战线中在既承认蒋和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及取消红军和苏维埃的同时，又争取中共的领导权；怎样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和红军力量；以及怎样在党内既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又“防止蒋在统一战线的叛变，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等，均作了深刻而具体的论述。^②

经过讨论，在主要是根据张闻天所提出的新的策略思想的基础上，会议确定了和南京谈判的基本方针，即：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抗日反蒋”并举的策略目前已不适宜，要与蒋和南京谈判联合和合作，扩大统一战线。同时，会议还确定了同南京谈判的基本条件。^③

会议之后，8月12日，以张闻天为首的八名政治局委员在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会议决定的电报中，将会议所确定的新的策略思想概括为“请蒋抗日”。^④同时，张闻天开始根据会议决定拟写“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即8月25公开发表的《中

①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结论”记录，转引自《学海》1990年第2期，第64—69页程中原文。

②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336页。

③ 引同上，第351页。

④ 引同上，第337页。

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9月1日对党内下发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两个重要文献。

在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请蒋抗日”，促成国共再次“联合”、“合作”的方针基础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电报精神与中共8月政治局会议精神一致。但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新的提法，如“民主共和国”口号等。在吸收“国际电报”中一些新的提法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变成“民主共和国”口号，并将“请蒋抗日”进一步变为“逼蒋抗日”方针。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蒋委员长”、“贵党”等称谓向蒋和国民党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自卫战争”的倡议。^①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下发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

9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17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报告和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南京政府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而且推动南京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战争之必要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用民主共和国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中共现在的策略方针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逼蒋抗日”。同时，报告和决议还在8月会议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原则，作了进一步系统而精辟的阐述，如：在维护合作抗战的基础上，绝不放松对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批评斗争；发挥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坚持中共对苏区和红军的绝对领导，保持中共和红军的独立性以及在统一战线下大力巩固与扩大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202页。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等等。^①

“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是中共策略的重大调整,它标志了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完善和成熟。上述工作的完成,无疑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其中,张闻天的主导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 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重新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而在当时复杂而紧张的情势之下,能否正确地提出解决事变的对策,这对中国共产党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事变发生突然,事变之后,不仅国际上英、美、苏、日分持不同立场;国内国民党内以及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均分别出现尖锐对立的意见;而且由于问题复杂,中共领导层内也出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主张,使其决策颇费周折。据新近出版的《郑颖超传》所述,周恩来于1936年12月15日受命出发赴西安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连续开了三天。^②又据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所记,周恩来曾告诉王炳南:当时“我们一个星期没有睡觉,想法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决定的事”。^③当此之际,张闻天处变不乱,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胆识。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

据斯诺记述,事变发生的当晚(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举行盛大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④对此,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也作了同样的

① 《张闻天选集》,第105页。

② 金凤:《郑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③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党凡英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④ 同上。

记述：“我也参加了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主要的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清算，才能为全中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红军的内战”。^①与下述毛泽东次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相印证，上述记载是可信的。当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也指示其发动人民，“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交人民审判”。^②

在当时大多数人出现急躁情绪的情况下，张闻天始终保持冷静，对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共应采取的对策作了清醒、正确的分析。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一个月，即蒋介石命令朱绍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苏区，国共处于严重军事对抗之时，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已指出，当前的形势是：“南京方面更有走上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本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③事变爆发次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相应对策。会上，在关于对蒋的处置办法和对南京的策略两大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作为军委主席并分管统战工作的毛泽东，主张“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好处”。^④他同时主张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⑤

① 转引自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同志电》，1936年12月12日（一作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③ 转引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1936年12月13日），转引自张魁堂前引文，《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⑤ 同上。

与会的其他中共领袖除周恩来、博古主张“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外^①，绝大多数人的发言也都主张“审蒋”、“除蒋”、“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张闻天的态度与此不同，针对会上大多数人提出的偏激主张，他明确地提出了“两不、两争取”的策略原则。他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抗日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策略上，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还指出，在形势突变的关头，处理问题更要冷静，“现在有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需要我们慎重考虑。这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②

张闻天提出的“两不、两争取”，推动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指明了正确方向，并得到与会者的原则同意。但是，由于与会多数人的坚持，会议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争取南京政府的方针的同时，保留了“除蒋”及“以西安为中心”的思路。在15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即仍要求其“自别于蒋氏”，“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③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的远见卓识。除蒋与否，并非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当时中国最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1936年12月13日），转引自张魁堂前引文，《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张闻天1936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1936年12月13日—1937年1月26日），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③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0页。

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即国民党、南京政府及中央军的维系的问题。事实是,此时在国民党内除蒋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他而能保持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走向分裂。同时,从力量对比看,以西安为中心控制南京的策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事变之后,全国舆论掀起一股拥蒋和谴责张、杨的浪潮;“讨伐”西安的军队大兵云集,内战一触即发。当此之际,中共中央原持“除蒋”意见的人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从而改变了看法,赞成力争和平解决事变。而在此前,张闻天和中共中央于15日派出主张“不与南京对立”的周恩来、博古等赶赴西安,相机行事,也成为促成“和平解决”的重要一着。

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转持“和平调停”立场。次日,张闻天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处理变变的方针。在中央领导者大多改变原来主张的基础上,张作了重要发言。关于对蒋的处置办法,张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他批评“审蒋”主张的错误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①发言中,张对事变发展前途的两种可能,中共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以及对失败可能性的准备等,作了全面的分析。针对事变后苏联对张、杨的激烈的公开抨击,张闻天明确指出,苏联当时“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的对立”,但中共不能采取同样立场。^②当时共产国际(实由苏联控制)与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张对问题的处理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有机结合。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除指出张、杨发动事变目的是抗日救国外,规定中共的任务是:一、坚持“和平解决”方针;二、用一切方法

① 张闻天 1936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载《党的文献》1988 年第 3 期。

② 张闻天 1936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载《党的文献》1988 年第 3 期。

“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三、同情并“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①

12月21日,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提出在六项条件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12月25日,蒋在作出抗日等项承诺后,由张学良护送离开西安。但蒋获释后立即将张学良扣留,以大兵进逼西安。东北军发生严重分化,内战阴云重新密布。在这种情况下,西安方面以“少壮派”为主,主张武力对抗南京的呼声很高,中共内部也有人主张对争取蒋系的策略发生动摇。这时,张闻天仍然坚持以抗日大局为最高旗帜,不为表面的现象所动摇,继续努力国内和平。1937年1月2日,张闻天再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提出对策,统一思想。在会上,张闻天对形势作了全面估量,指出:“南京方面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蒋介石)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方面来分化西北”,“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而将“主要火力向着亲日派”。^②张的分析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为中共中央采取对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情势最紧张的关头,张还亲自秘密前往西安,直接领导处理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统一战线进入国共双方正式谈判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和谈进程,表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之诚意”,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起草了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该电要求国民党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下,实行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完成抗日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国策;中国共产党则作出停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② 张闻天1937年1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与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此后,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了停止武力“剿共”、正式重开国共谈判的态度。该会宣言和决议提出了“和平统一”方针,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事实证明,从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启动到瓦窑堡会议对这一策略的正式确立,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方针调整,从西安事变爆发到最终和平解决,张闻天一直代表和主导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方向。

(作者单位:云南昭通师专历史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